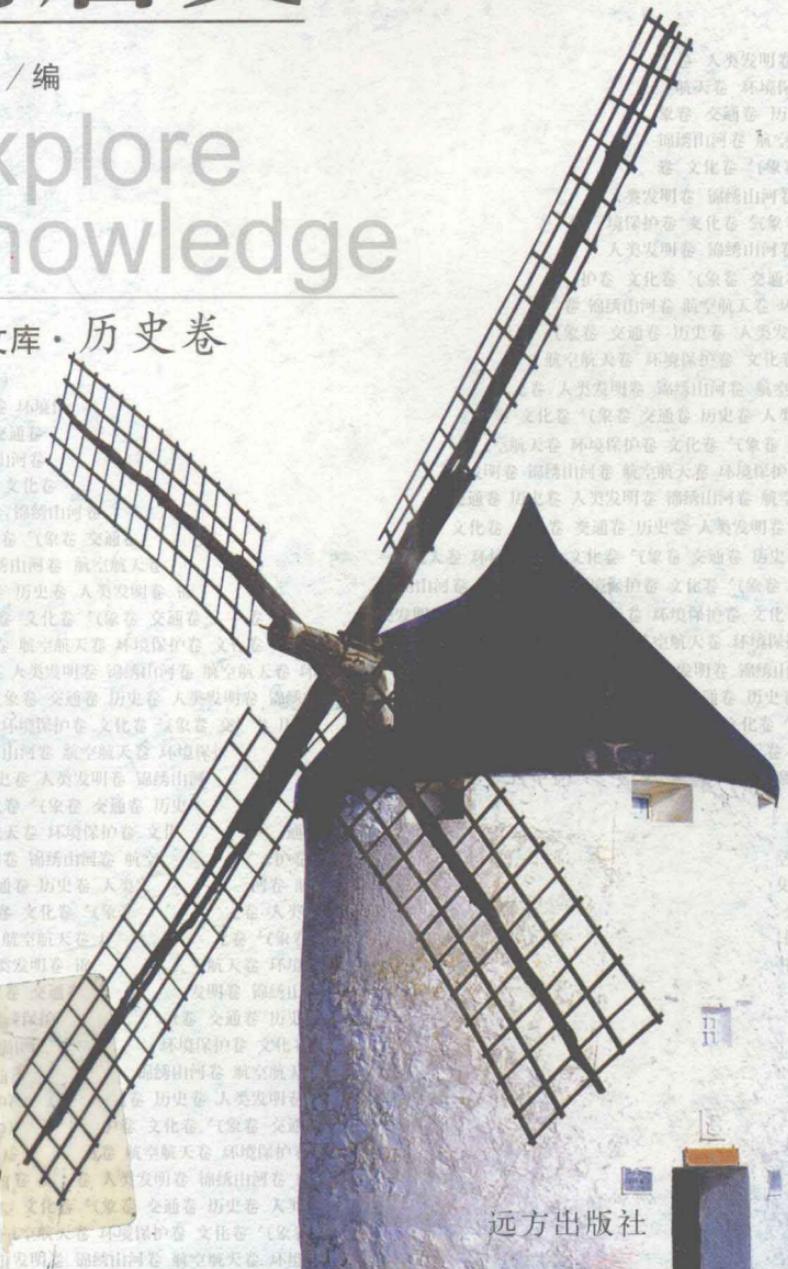


隋唐史

留 明 /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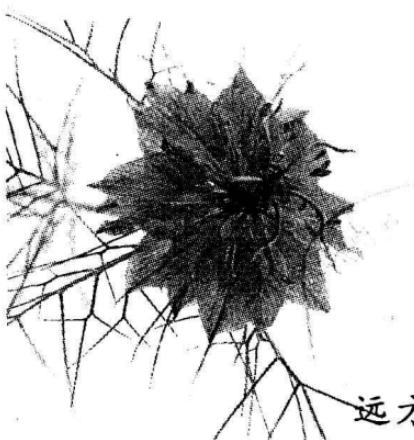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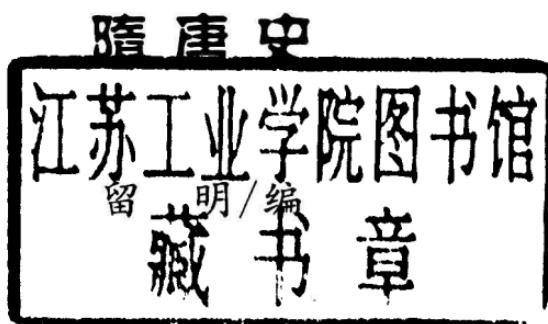
Explore
Knowledge

探索文库·历史卷



远方出版社

探索文库·历史卷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心 儿

**探索文库·历史卷
隋唐史**

编 著 者 留 明
出 版 方远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升印刷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3900 千
印 数 3000
标 准 书 号 ISBN 7—80595—955—2/G · 325
总 定 价 968.00 元(全套共 10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的发展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人类教育的面貌和图景却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国际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课堂教学模式和学校的功能却依然故我。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的工作，可以发现其工作方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学校课堂仍更多地维持着本世纪初的框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阎立钦教授认为：“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其核心是在认真做好‘普九’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国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着重研究和解决基础教育如何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

在本世纪，我国教育工作者高高扬起创新的旗

帜，既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我国教育一百年来自身发燕尾服的需要，更是弘扬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

接受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知识就是力量”是接受教育的名言，也是接受教育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缓慢，学校教育内容的相对稳定，为以知识为中心“接受教育”的存在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编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的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 目

→ 录

隋	(1)
隋文帝杨坚	(19)
隋炀帝杨广	(22)
唐	(25)
唐高祖李渊	(100)
唐太宗李世民	(103)
唐高宗李治	(106)
武则天	(108)
唐玄宗李隆基	(112)
唐代宗李豫	(115)
唐德宗李适	(117)
唐宪宗李纯	(118)
唐武宗李炎	(121)



隋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统一王朝，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历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恭帝杨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帝年号二：开皇（581~600）、仁寿（601~604）；炀帝年号一：大业（605~618）；恭帝年号一：义宁（617~618）。大业五年（609）时的隋朝疆域，东、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下统郡（州）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隋
唐
史

隋朝的建立和强盛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皇室据说出于汉代以后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杨坚父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坚女为周宣帝皇后。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赟传位于其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是为周静帝，宇文赟自己以天元皇帝名义掌握政权。次年五月宇文赟死，静帝时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下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以左大丞



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名义掌握军政大权。

杨坚并无煊赫大功，也没有超越诸大臣的实权与重望，仅凭借军事贵族的家世与后父的地位得掌大权。但由于周宣帝诛戮大臣，当时朝中已无有力的反对派；杨坚掌握府兵集中的关中，军事上对地方居于优势。他在元老宿将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凭仗关中军事力量，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三方叛军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齐旧臣有关。特别是尉迟迥，所用多齐人，如亲信谋士崔达、翟如就是第一流高门博陵崔氏。他起兵时，据说“赵魏之士，从者若流”，不久就至数十万众，尉迟迥起兵实际上代表了关东士族豪强的割据愿望。司马消难自己就是北齐旧臣，王谦所用之人也有北齐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所以，杨坚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割据力量。

隋史

平定地方叛乱的同时，杨坚还屠戮了宇文氏诸王。在消灭内外政敌以后，他自左大丞相迁大丞相，并于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统一南北 自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分裂将近三百年，历史发展倾向是统一，隋朝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相对抗。开皇二年（582），隋军挫败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陕西西北部）的突厥军。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随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经隋朝同意，率部内迁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获得安定。隋朝的力量于是转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合九十总管之兵五十万八千人，以晋王杨广为统帅，沿长江中、下游分兵



八路，大举南进。次年正月，隋大将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韩擒虎自采石渡江，东西两路直指建康。贺若弼激战于钟山，打败了前来迎战的陈军；韩擒虎因陈将领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宫城，俘后主陈叔宝。长江中下游的陈军随即或降或破；岭南方面，在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妻冼夫人（少数民族人）的协助下也迅即安定。这场统一战争从发兵到战事结束，不过四个月。

隋朝平陈之后，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籍上户数共五十万，人口两百万。以后，隋又迁陈朝皇室和百官家属入关中。江南士族高门从此更加衰落。



陈亡之后，江南士族高门虽大都北迁，但梁陈时正在扩大势力的地方豪强以及所谓“溪洞豪帅”却仍然保有实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强的特权。豪强们认为统一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皇十年冬，遍及陈朝旧境的反隋暴动爆发。当时谣传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迁入关中，豪强们因此得以纠集民众，大股数万人，小股数千人。隋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领兵镇压。统一是大势所趋，分裂割据不可能真正获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强们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军将其各个击破，大约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门的北迁和这次镇压，沉重打击了江南的割据势力。

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三百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

完成和巩固统一的改革 在文帝统治时期和炀帝统治



的前期，隋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完成和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

改革行政制度 开皇元年，文帝初即位就废除了西魏、北周时期仿照“周礼”制定的中央官制，即所谓“六官制”。又综合参酌魏晋以来的变化，基本形成以尚书、内史（即中书，避杨忠讳改）、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这一制度后来为唐代继承和发展。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侨立州郡和其他原因，州郡设置多而且乱：或地不满百里设置数县，或两郡共管一县，有的郡则没有属县。州、郡、县名重复出现，混淆不清。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州置刺史，废除过去例加的将军号以及军府、州府两套僚佐的制度，将州府和军府合一。隋还沿用旧制，凡军事上较重要的州设置总管，兼任刺史，一个总管统辖邻近几个州的军事。隋初曾设置尚书行台节制一方，后虽废罢，但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扬（今属江苏）、荆（今湖北江陵）、益（今四川成都）四大总管，所辖多至数十州，实即尚书行台的后身。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府，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改革选举制度 汉代以来，中央的三公府（包括与三公地位相等的最高级官僚）和地方州、郡、县府的属官照例由长官自行委任，即所谓“辟举”。地方机构属官也规定必须由本地人充当。随着士族豪门势力的强大，辟举道路被他们垄断，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经过长期演变，公府辟举权实际上不再存在，地方军府的幕僚已不限于本地人，地方州府的辟举权也日益削弱，但仍然是士族豪门的人仕途径。同隋代的地方制度改革相适应，开皇末年实





行六品以下官吏全部由尚书省吏部铨举之制，地方各级机构的属官从此由朝廷委任，也不局限于本地人，彻底废除了传统的辟举制。

保证门阀世袭的九品中正制也在隋代废除。隋初，虽仍沿袭北朝设置州都（即州中正）、郡正、县正（避杨忠讳去“中”字），废郡后，郡正当然不存在，州都和县正实际上已不再品定人士。州郡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表明门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弟仍可以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的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代选举中仍居优势。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长期由士族垄断的州郡岁举（秀才和孝廉）在南北朝后期也已向一般地主开放。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秀才除试策以外往往加试各体文章，录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不过十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与明经。明经之名早见于汉朝，但不是经常科目。进士科是炀帝所创。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可能还试经。这两种新科目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很少，录取的人在政治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手工业和商业 隋代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隋代墓葬中发现的白瓷和碧玻璃瓶，说明在陶瓷手工业上的突破（据记载，这种碧玻璃是工艺家何稠创制的）。成都和魏郡（今河南安阳）都以制造精美的雕刻物著称。江南传统的造船业仍继续发展。为了伐陈，文帝曾命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督造大批战船，最大的有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炀帝巡游江都所用的船只，在





隋
唐
史

扬州制造，其中皇帝乘坐的龙舟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此外，还有大小船只数千艘。隋代手工业生产结构基本上承袭前代，除了广泛的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外，一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居住在城市，他们主要以家庭成员组成手工作坊，父子相传，成为匠户。史籍记载，邺城郊郭居住着技作商贾，精美的雕刻物和曾经进献给文帝的绫文布都是由这些技作户制造的。建造战船和龙舟的工人大量为征自民间的丁夫，也包括具有造船技能的专业工匠。开皇十八年，文帝曾下令禁止江南民间私造大船，船长三丈以上的一律没收，说明民间存在着造船工匠。这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虽然也允许自己开业，但却牢固地受官府的控制。他们具有特殊身分，隶属于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不属州县，每年轮番到所属官府作坊中服役两个月，免除一般百姓所服的兵役和力役（一般力役是每丁一个月），租调是否减免不详。除了番上工匠以外，可能还有一些长期在官府作坊中服役的。官府手工业原先由主管金帛储藏的太府寺兼管，炀帝把这部分职权划归少府监。少府监有左尚（制造车舆和随车仪仗等）、右尚（制造甲胄、鞍辔及其他杂物）、内尚（制造祭祀用品和宫廷所用精巧工艺品）、织染（制造冠服和染色）、掌冶（熔铸铜铁器）等署，分管各专业作坊。此外，还有主管建筑的将作监，下有左校（管理木作）、右校（管理泥作）、甄官（管理石作和烧造砖瓦）三署。少府诸署的劳动者是所属的各种专业工匠，将作监诸署的粗重劳动则作为正役征发百姓。

在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安定的条件下，隋代商业也获得发展。早在隋初，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汴州郭外有船客散居，这些船客应是商人。北齐故都邺城的郊郭也居住着许多商贾、工匠。成都是西南最大的都市，历来以手工业、商



业繁盛著称。长江流域大致仍然继承着南朝商船往来不绝的情况。开皇十八年文帝所禁止的江南民间私造的大船，多半是用以运货的商船。沿江东下，自江陵、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以至下游诸郡治所在的城市，商业都比较发达。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通道。陆道以张掖为中心，聚集着国内西北各族和外国商人，炀帝曾派遣裴矩到张掖去主持贸易事宜。南海（今广东广州）是最大的贸易港口，输出丝绸，输入象牙珠宝等传统商品。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帝兴建大兴城（新的长安城），置有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炀帝兴建东都后，洛阳的商业比长安更为繁盛。洛阳置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开十二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大同市周围四里，开四门，一百四十一区，六十六行；通远市周围六里，有渠通往洛口，可通大船，来自各地的船舶数以万计。长安、洛阳和张掖、南海不仅是国内的大都市，也是国际的贸易中心。

隋代的手工业、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继承着前代体制。手工业以家庭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为主，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性质。店肆必须设在官置的市内，官市则限于郡、县治所。隋文帝恪守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令狐熙为汴州刺史时，便奉行文帝意旨，抑制工商；开皇十六年，文帝下诏不准工商入仕为官。这种措施反映了封建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

炀帝的继位 隋代许多改革是文帝和炀帝两朝完成的。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内领禁卫，外统故齐之地，后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经获得文帝的宠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独孤皇后逐渐失去对他的信任。次子杨广同样奢侈好色，但却善于矫饰，貌为节



俭孝顺，博得父母宠爱。他与大臣杨素勾结，向文帝揭发杨勇的过失。文帝和杨勇间的感情日益恶化，文帝甚至怀疑杨勇有篡夺皇位的意图。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杨广继位，是为炀帝。传说文帝是被杨广暗害的。

炀帝即位时，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身居并州总管重任，统辖今山西、河北、山东境内五十二州，手握强兵。他早就觊觎皇位。七月，炀帝即位，八月，杨谅就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反叛。杨谅虽然拥有可观的兵力，但改变不了关中的军事优势；他用兵又举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杨素领兵镇压了。



隋
唐
史

大运河的开凿 为了控制地方，扩大南北漕运，隋朝在开皇四年曾开凿由长安新城——大兴城到潼关的漕运渠道，称为广通渠，又名富平渠。炀帝继位后，从大业元年（605）至六年，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河入汴、由汴入淮的通济渠；由淮入江的邗沟；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南达黄河、北抵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相衔接为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自涿郡到余杭，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它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转输，而且大大加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隋朝与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 早在文帝开皇四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就已与隋和好，五年，南迁塞内。十九年，隋朝扶助启民可汗为突厥主。他对隋非常尊重。大业三年炀帝巡视北境，到了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启民可汗来朝，炀帝在千人大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和诸部落酋长等三千五百人。在巡游途中，炀帝又亲自莅临启民可汗牙帐

和部落所在地，接受款待。

西突厥由于内部纷争和对铁勒的战争，力量削弱。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入朝炀帝于涿郡的临朔宫。处罗可汗的部众，羸弱万余口，由处罗弟阙度设统率，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另一部分由特勤大奈统率，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

大业前期是隋朝极盛的时期。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河右，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平后，隋在今青海及新疆境内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端）、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原来受突厥控制的伊吾吐屯设内附，随后，隋于其地设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高昌国王麴伯雅亦到张掖朝见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便全部被隋朝所掌握。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设置了西域校尉。当年六月，在燕支山下，炀帝在巡游用的“观风行殿”（下有轮的巨型活动房屋）上张设盛大宴会，款待伊吾吐屯设、高昌王和其他来朝的各族首领三十多人。

在岭南地区，原高凉太守冯宝妻谯国夫人冼氏，自平陈后，即协助隋派来的将吏安抚当地俚僚诸族。滇南地区在开皇二十年亦获安定。

台湾自孙吴以来，和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隋代称之为流求。大业三年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次年，朱宽再次到那里安抚当地人民；同年又派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出海到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是商旅之船，纷纷前来贸易，由此可知大陆商人是经常到流求进行贸易的。此后，台湾海峡两岸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隋和外国的关系 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强盛的封建统一大国，隋朝为远近各国所向往。文帝是个务实的政



隋唐史



治家，他的注意力重点在于内政，力求国内各族间的安定，不事远略。他曾因为往来风浪险恶而谆嘱百济使人不必每年入朝，因而开皇年间对外交往较少。炀帝想要宣扬国威，他即位后，就下诏召募能够出使远方的使人。大业三年，他派遣使者从海道出使赤土（大致在今马来半岛）和日本，大约在同时，由陆道遣使到吐火罗、罽宾（通指今克什米尔一带；隋代一度指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石国（今前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天竺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波斯（今伊朗）。大业中，许多国家遣使来隋。炀帝主观上只是为了树立他大一统皇帝的崇高威望，客观上开展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进一步在亚洲各国间广为传播。

朝鲜半岛一向和中国大陆有亲密的关系。魏晋以来，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三国中除了高丽曾和隋发生战争外，百济、新罗都和隋朝有友好关系。伐陈时，隋的一艘战船漂流出海，返航途经百济，获得百济资送，并遣使祝贺隋的统一。炀帝统治时，百济、新罗都多次遣使来隋。

日本自东汉以来，以倭国的名号为中国所知。南北朝时曾八次遣使刘宋、萧齐，中国文化进一步在日本传播。隋时，日本圣德太子执政，他渴望引进文化，在本国进行改革，便几次遣使来隋。炀帝也曾遣裴世清报聘。日本使人来时随行有学生和僧徒，他们长期留居中国，学习佛法，也学习礼制和政令，多数直到唐初才返国。通过他们，隋唐的礼制、政令在日本传播，对日本划时代的大化革新起了推动甚至指导作用。这些学生和僧徒多数是新旧日籍汉人，他们成为引进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

东南亚各国早在两汉时就和中国有往来，南北朝时和



南朝交往。和隋通使的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赤土、真腊、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或巴厘岛)、丹丹(在今马来西亚马来亚东北岸的吉兰丹或其西岸的天定,一说在新加坡附近)、盘盘(今泰国万伦府万伦湾沿岸一带;一说马来半岛北部克拉地峡一带)等十余国。其中,文帝统治末年曾和林邑以兵戎相见,随即和好,其他各国都曾在炀帝时通使。

那时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有所谓昭武九姓国,即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等国。九姓国都在大业中遣使来隋。

炀帝统治着幅员广大的国家。全国的在籍户数将近九百万,口数将近五千万,还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裕国库。炀帝志得意满,加意粉饰太平。大业五年冬,他征集四方艺人到东都,次年正月在东都端门街布置了历时一个月的表演大会,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大会期间,三市的店肆张挂帷帐,置备酒食,主管人员带领各族人入市贸易,所到之处,都以酒食款待。

东都大会表现了统一王朝的盛况。但也就是在大业六年正月,洛阳发生了弥勒教徒的起义;六月、十二月在北方的雁门(今山西代县)、南方的朱崖(今海南省东北部)又先后爆发了人民起义。三次起义的规模都不大,迅即被镇压,但却是强盛的隋王朝崩溃的讯号。



隋朝的覆亡

繁重的劳役征发 导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无限制的劳役征发。炀帝营建东京、修长城、开运河,虽有一定